

《全宋诗》

重出误收研究

朱腾云 著

● 河南大学图书馆学术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全宋诗》

重出误收研究

朱腾云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宋诗》重出误收研究 / 朱腾云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5

(河南大学图书馆学术丛书)

ISBN 978 - 7 - 5203 - 0370 - 5

I. ①全… II. ①朱… III. ①宋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990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全宋诗》重出误收研究（13YJC751086）”项目资助
- ◆ 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创新团队建设项目资助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	(1)
第一节 重出误收通论	(1)
第二节 宋诗文献整理与《全宋诗》的编纂	(36)
第三节 《全宋诗》重出误收诗研究现状	(67)
第二章 《全宋诗》重出误收的类型	(77)
第一节 姓名讹误	(77)
第二节 亲朋讹误	(92)
第三节 诗句诗题丛脞讹误	(106)
第四节 其他讹误	(114)
第三章 《全宋诗》重出误收的时代情况	(126)
第一节 误收前代诗	(126)
第二节 误收同代诗	(167)
第三节 误收后代诗	(187)
第四节 两收诗《全宋诗》不误	(197)
第五节 两收诗存疑	(210)
第四章 《全宋诗》重出误收的原因探讨	(218)
第一节 来源错误	(219)
第二节 编纂新误	(240)
第三节 其他因素	(261)

第五章 《全宋诗》重出误收研究的延伸思考	(265)
第一节 重见诗人研究——《全宋诗》重出误收视域的拓展	(265)
第二节 化用传引与悬置存疑现象分析——《全宋诗》重出误收 考辨的困惑	(294)
余 论	(317)
主要参考文献	(323)

第一章

引 论

第一节 重出误收通论

重出误收现象，在文献档案中大量存在，特别是古典文献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自有文献之日，便是重出误收产生之时。纵观文献编纂的历史，每一次大大小小的文献编辑活动，都会有意无意消弭一些文献的重误，但同时又会不经意间产生一些新的重误。而文献积累演化过程的基本特征是总体层累扩展、局部老化消弭，在这种文献的双向互动趋势中，重出误收问题越来越成为大型诗文总集整理中不可回避的难题。

在漫长的封建历史演进中，由于天朝上邦对自己帝国的盲目自信，对世界潮流缺乏真正的了解，所谓的大一统政治结构体系，也使帝国的政治、学术发展局限在一个特定框架之中，依靠学术自身的更新发展，很难从质的方面获得凤凰涅槃式的突破。正是在这种对外部世界的轻忽中，帝国渐次趋向羸弱，当帝国的大门被迫打开，整个帝国和帝国的臣民四顾惘然。社会精英层突然意识到已走到亡国灭种的边缘，民族的沉痛灾难，促人梦醒，一次次探求反思，西学东渐，学术大变。延绵今日，多元同异之中，传统学问的底蕴被消磨，商品经济大潮之下，学风粗疏，义理不明，国学在自身和外界的两重重压之下，处境尴尬。文献学作为国学研究的根底，自然也成为被边缘化的学问，而文献的重出误收作为文献整理研究的组成部分，从来就不曾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在我们翻检重出误收研究的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时，吉光片羽，林林总总，如漫天繁星，细琐零碎，难成系统，不见体系，有很多理论问题晦涩难明，对

“重出误收”这组概念的历史描绘和逻辑阐释遇到了极大困难。

我国的古籍整理事业，相伴中华民族文明的演进，绵延数千年，从来不曾中断。有文字记载、清晰可考的古籍整理历史，就有两千多年。文献整理中篇章片段的交叉复合、文献篇目的重误讹漏，在早期文献未定型的时代，是一个普遍的存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伴随各分支学科（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注释学、辑佚学）的发展，逐渐成形。这贯穿了整个古籍整理的漫长历程，实践不断丰富，理论也渐次不断发展，其经验之丰硕，于“国学”中，独树一帜，无可匹敌。但中国古典文献学历来只偏重于实践，缺少理论性的概括总结，此问题在我们关注古籍重出误收现象之时，尤为明显。追溯重出误收现象的源头，探究重出误收现象的发展，很难看到一个清晰的脉络，很难用简洁、清晰、经济的语言对重出误收的概念作出精准的解释，很难建构起“成一家之言”的理论框架。这里只能采用审慎的科学态度，于繁杂的文献材料中，推演重出误收的发生学特征，来解析、描述重出误收概念的基本内涵，揭示其在本课题的外延范围。

一 重出误收的简单定义

原始先民结束了茹毛饮血的野蛮，步入钟鸣鼎食的文明，相伴文字的产生、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文献记录日益扩展到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文献记录者不同，对相同的记录对象会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记录方式，这样就会产生文献原始的歧异，这些歧异是重出误收最早的源头。比如：《春秋》经传、《孟子》《史记》，记载武王伐纣为大义灭无道，纣师倒戈，兵不血刃，一鼓天下定。而《尚书·武成》《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此战，流血漂杵，赤地千里。何为真何为假？何为是何为非？何为正何为误？对文献记载的正误，有时不仅仅体现在历史真实本身，记录者、叙述者的政治立场，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往往会给历史本身打上自己的烙印，就武王伐纣而言，儒家喜言兵不血刃，纵横家尚谈流血漂杵。此种载记不同，产生的文献歧异，似与误收无关，其实它们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记载者从各自代表的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出发，加入更多的政治文教宣传要素。古代官修文献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会人为造成一

些讹误，如《四库全书》的编纂，太多的政治元素，带来了大量不应有的删改。《全唐诗》的编辑，对季稿本的故意湮灭。又如《群书四部录》200卷，多种目录著为元行冲奉敕撰，实为殷践猷、毋煖等编。《唐会要》卷三六：“（开元）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左散骑常侍元行冲上《群书四部录》二百卷，藏之内府。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经库殷践猷，王愬编，史库韦述、余钦，子库毋煖、刘彦直，集库王湾、刘仲丘，其序韦述撰。”^①《旧唐书》的修撰、进呈也是这样。《全唐诗话》是一部具有重要文艺理论价值的著作，其作者本为廖莹中。廖氏依附奸相弄权，似道败亡，莹中服毒，其人为世人不齿，刊印者假借尤袤之名刻印，后世不察，遂以作者为尤袤。《总目》：“考周密《齐东野语》载贾似道所著诸书，此居其一。盖似道假手廖莹中，而莹中又窃据旧文，涂饰塞责。后人恶似道之奸，改题袤名，以便行世。”^②所以在解读文献时，应该强记博识，睁大慧眼，尽可能地抹去人为的痕迹，剔除伪误，恢复文献的本真，还原历史的面貌，这是进行文献阅读与整理的第一要义，也是孟子所言“尽信书不如无书”之意。

文献的传抄讹误是重出误收的另一源头。比如：王曾《献金陵牧薛大夫白马诗》：“白马披丝练一团，今朝被绊欲行难。雪中放去唯留迹，月下牵来只见鞍。向北长鸣天外远，临风斜坠耳边寒。自知毛骨还应异，更请王良子细看。”（《全宋诗》册3卷143页1589）。又见《全唐诗》卷508，题为《絷白马诗上薛仆射》：“白马披鬃练一团，今朝被绊欲行难。雪中放去空留迹，月下牵来只见鞍。向北长鸣天外远，临风斜控耳边寒。自知毛骨还应异，更请孙阳仔细看。”作者平曾。

平曾，唐穆宗时人。以府元被绌者九人，曾其一也。长庆初，同贾岛辈贬，谓之举场十恶。曾后谒李固言于蜀。卒以恃才傲物，没于县曹。^③

王曾（978—1038），字孝先，青州益都人。真宗咸平五年（1002），

^① （宋）王溥撰：《唐会要》，清乾隆四十二年武英殿刻本。

^② （清）永瑢、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③ （清）曹寅等编：《全唐诗》卷508，清康熙扬州诗局刻本。下引《全唐诗》同此版者，不一一列明版本。

试礼部及殿试皆为第一，后封沂国公，宝元元年卒，谥文正。^①

平曾作见《云溪友议》卷中、《山西通志》卷二二九、《御定渊鉴类函》卷四三四、《太平广记》卷二五六、《全唐诗》卷五〇八、《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四〇五、《诗话总龟》卷五、《唐诗纪事》卷六五。王曾作出《诗人玉屑》卷一〇，翻阅此卷，转引自《云溪友议》，误平曾为王曾，《全宋诗》编者不察，沿用其误。另此诗本事最早见《云溪友议》卷中，此书早于王曾，证明王曾不可能是诗作者。

总之，不同时期文献整理者因文献掌握的数量、质量，整理者自身的因素，文献整理采用的方法，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文献整理的最终成效。有些整理工作无法消弭文献的分歧，而随着部分原始文献的散佚，很多分歧自然消失，不为后世学者所知。同时文献整理也会部分地放大某些分歧，带来更多的重出误收。究其本质，其根源于文献的综辑整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文献综辑工作，从整理的性质目的可分为经济行为、政治行为、宗教行为、职务行为等几种情况。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各种行为目的往往不是纯粹的，而是混杂的、复合在一起的。比如刘向父子的大规模文献整理，就是政治理想诉求，又是一种职务行为。因为本书研究对象的原因，下文主要讨论文学总集、别集编纂中的重出误收现象。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研究，在极其漫长的文献演变历史进程中，伴随着文学的自觉，逐步获得了自己的学术畛域，并随着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进展，越来越被重视。而对重出误收现象的研究也在这个过程中展示了其自身的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成为文献整理研究中的一个潜在学术动力股。本研究依据重出误收在文学、文献学中递归、嬗变的轨迹，来解读它们的范畴意蕴和学术意义。

（一）重出释义

“重出”即重复出现，其义明白晓畅，懂汉语者皆知。古典文献之中，“重出”一词很常见，多用其本义，但在不同的语义场中，其含义的指向性和确定性是不同的。如：晋葛洪《抱朴子·省烦》：“五礼混挠，杂饰纷错，枝分叶散，重出互见，更相贯涉。曲儒寻案，犹多所滞，驳

^①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8页。下引《全宋诗》皆出此版，为节约篇幅，所引诗歌、作者小传等一般采用随文夹注，不一一列明版本。

难渐广，异同无已。”^① 此处“重出互见”指多种文献中关于五礼的内容，纷纭重复，参差互见，已经有文献学上内容、篇章、片段重出的含义。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第八》：“王恭有清辞简旨，能叙说，而读书少，颇有重出。”^② 此处指表情达意多有重复的意思。《梁书·武帝纪上》：“我若总荆雍之兵，扫定东夏，韩白重出，不能为计，况以无算之昏主，役御刀应敕之徒哉。”^③ 此处是重生、重新出现的意思。唐韩愈《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其说汪洋奥美，关节开解，万端千绪，参错重出。学者就传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④ 此处指学术观点错杂交互。“《丹阳集》一卷：谨按：《东观余论》云：‘《丹阳集》已见总集，此重出。’（按：《崇文总目》各门中，疑于重出者尚多，因无别本，不敢定其为重出，惟此条是黄伯思已经纠正者，自此以外则未敢遽为删并尔，附识于此。）”^⑤ 此处指条目重见。方以智《通雅·宫室》：“薄版曰望版，或用望砖存中，盖谓重出之飞檐耳。升庵以为天花版。”^⑥ 此处系重叠之义。鲁迅《古籍序跋集·〈云谷杂记〉序》：“其与《大典》本重出者，亦不删汰，以略见原书次第云。”^⑦ 此处重出是不同文献、版本间重复的条目。前引数例，“重出”一词的语义场虽各不相同，但都是“重复出现”的意思。正是由于传统之学，并没有把“重出”作为特定文献学专业术语进行界定，其含义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文献重出的研究，没有能够像校勘、音韵、训诂那样成为范式典型的文献专学，而更多地归属于校勘学。

重出误收现象的研究，随着学风的变迁，随着现代学术研究的多元化趋势，如何以理性的心态、冷静的气度重新解构传统并赋予创造性的转化，如何采用行之有效的现代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使其成为一门文献专学，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① （晋）葛洪撰：《抱朴子》卷31，扫叶山房1919年刻本。

^② （刘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卷下，清光绪三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

^③ （唐）姚思廉撰：《梁书》卷1，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页。

^④ （唐）韩愈撰：《昌黎先生集》卷28，明嘉靖徐氏东雅堂刻本。

^⑤ （宋）王尧臣等编次：《崇文总目》卷11，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四库全书》本。

^⑥ （明）方以智撰：《通雅》卷38，清康熙龙眠姚氏刻本。

^⑦ 《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重出”在文学、文献学研究中作为专业术语，主要有两种基本意蕴。

1. 文学批评术语——犯文

“重出”作为专业术语，首先并未出现在文献学领域，而是作为文学批评的概念，最早见于《文心雕龙》。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练字》：“重出者，《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① 刘勰强调在写作过程中，关键的地方，一字千金，相犯难避，语言的锤炼非常重要。后世诗评家论诗歌作法，谋章炼字，多本于此。

重出在“犯文”意义上运用，指文字、文意相犯。可分为字重、句重、文重、意重等。在文艺理论、文学批评领域，有着广泛的使用。

《雨村词话》：“万俟《雅言》三台末段‘汉宫传蜡炬’，疑‘蜡炬’二字重出。后得粤中藏书家元刻本作‘汉蜡传宫炬’，为之爽然。”^② 强调一字是否重出，从诗歌美学出发，对诗歌鉴赏而言，便是两种天地。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丽辞》：“张华诗称‘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③ 这是在句重犯文的意思使用重出的概念。

后世论诗属文重出概念，多本于此。

权重出，谓同字相犯也。诗验适会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唐宣宗尝问中书舍人李藩，考试之中重用字如何，又问孰诗重用字。对曰：“钱起《湘灵鼓瑟诗》有二不字。”上诵其诗仍称善相属，盖亦知其相避为难云。^④

胡震亨论诗强调以意为先，不避重出，实为诗道高手。

^① (梁)刘勰撰：《文心雕龙》卷39，金溪王氏增订汉魏丛书本，清乾隆五十六年刻本。

^② (清)李调元撰：《雨村词话》卷3，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30页。

^③ (梁)刘勰撰：《文心雕龙》卷35，清乾隆五十六年金溪王氏刻本。

^④ (明)胡震亨著：《唐音癸签》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吴乔论诗，以为唐诗、明诗，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相去有天壤之别，唐诗最下者，与明诗最高者比较，仍以唐诗能自见品位。其品评如下：

许浑诗，当时谓为“不如不做”者也，今又于浑诗中举最死实者，如《题卫将军庙》云：“武牢关下护龙旗，挟槊弯弓马上飞。汉业未兴王霸在，秦军才散鲁连归。坟穿大泽埋金剑，庙枕长溪挂铁衣。欲奠忠魂何处问？苇花枫叶雨霏霏。”首联言战功，次联言高蹈，三联言坟庙，四联以情景结之，题中之意自足，措词无一字虚壳。但许诗俱无远神，故当时不重之耳。明初咏白燕者，纷然推袁凯第一，称为袁白燕。起句云“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王谢见应稀”，失之于泛，燕亦可用。次联云“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二语是操，第三联应纵，而曰“柳絮池塘春入梦，梨花庭院雨沾衣”，与次联轻重无别，如时文之后，亦实做如中比也。唐人之中二联无虚实者，必第七句转，末句收。凯不知此法，其末联云“赵家姊妹多相妒，莫向昭阳殿里飞”，语泛与起同。八句中起结是燕，非白燕，第三联重出，止有两句是白燕，比《卫将军庙》诗如何？使凯学识大进，重作此题，于白燕上一丝不披绮纱袍子，口唱《大江东去》，为牧斋所鄙笑。由其但学盛唐皮毛，全不知诗故也。^①

此处吴乔品评唐诗、明诗，于谋篇布局之中，讲求句法不可重出，重出则体格卑弱，只见皮毛。

清代诗论家赵翼极大地发展了诗歌批评的重出理论，扩大了它的应用范围，由炼字扩展到用韵、用典、句法、谋篇。《瓯北诗话》载：

诗有一首中用重韵者。任彦升《哭范仆射》一诗三押“情”字，沈云卿《天长地阔》一诗三押“何”字，王维《暮云空碛》一首两押“马”字。“一从归白社，不复到青门。青菰临水映，白鸟向山翻。”“青”“白”二字，一首中重出。《九成宫避暑》三四“衣上”“镜中”，五六“林下”“岩间”，句法亦重出。岑嘉州“云随马”

^① （清）吴乔著：《围炉诗话》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本。

“雨洗兵”“花迎盖”“柳拂旌”，一首中句法亦重。王世懋《艺圃撷余》：张谓《别韦郎中》诗，八句中五地名。卢象《杂诗》，八句中四地名。王昌龄《送朱越》一绝，四句中四地名。孟浩然《宴荣山人池亭》律诗，七句中用八人姓名。田艺衡《香字诗谈》谢惠连诗“屯云蔽层岭，惊风涌飞流。零雨润坟泽，落雪洒林丘。浮氛晦崖巘，积素惑原畴”，六句句法相似。张正见诗“含香老颜驷，执戟异扬雄。惆怅崔亭伯，幽忧冯敬通。王嫱没胡塞，班女弃深宫”，六句中引用六古人。王世懋、都穆、田艺衡皆以为今人诗若此，必厌其重复，在古人正不若是拘也。然究是诗中之病。若李白“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四句中用五地名，毫不见堆垛之迹，此则浩气喷薄，如神龙行空，不可捉摸，非后人所能模仿也。骆宾王“林疑中散地，人似上皇时。芳杜湘君曲，幽兰楚客词”，二联中用四典，亦不见其重叠，此又剪裁之妙。^①

作为文学批评的概念，重出是谋篇布局、炼字用词应该着力避免的，此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对诗歌的创作和诗歌的鉴赏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赵翼在《陔余丛考》中的论述，其针对诗句重出现象，提出“复句”的说法，把重出的概念由字重延伸到句重、意重，而隐然有诗文整理中重出误收的含义，给我们更多启示。

元遗山诗多复句。

古来诗人佳句，罕有重出者，惟任昉《别谢言扬》诗“讵念耋嗟人，方深老夫托”。又《报刘孝绰》诗“讵慰耋嗟人，徒深老夫托”。宋璟《和御制》，璟与张说、源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赐诗应制》中有“圣酒江河润，仙文象纬舒”之句，而《和圣制送张说巡边》内亦有“圣酒江河润，天词象纬明”，但改三字耳。许浑《京日寄友人》诗有“一尊酒尽青山暮，千里书回碧树秋”之句，而《郊园秋日寄友》诗又用之。《呈郭少府》诗有“江村夜涨浮天水，

^① （清）赵翼著：《瓯北诗话》卷12，清嘉庆湛贻堂刻本。

泽国秋生动地风”之句，而《汉水伤稼》又用之。《送僧归桂州》诗“楚客送僧归桂阳，海门帆势极潇湘。碧云千里暮愁合，白雪一声春思长”，而《和刘三复送僧》诗亦用此四句，但改“桂阳”为“故乡”耳。苏东坡亦间有复句，如《迩英拜赐御书》有云“捷书夜到甘泉宫”，而《洮西报捷》诗亦云“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又“前生自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既用于《答周循州》诗内，又用于《赠虔州术士谢晋臣》诗内，但赠谢诗换“自是”为“恐是”耳。赵秉文《滏水集·济源绝句》云“树映楼台水映空，溪容林意两溶溶。夏山如醉无人画，远处微茫近处浓”，《题刘德温湖山丰夏图》又云“远处微茫近处浓，岸容林意两溶溶。夏山如醉无人画，更倩刘郎作几峰”。

此皆诗句之复出者，然此外亦不多见，惟元遗山复句最多。如《怀州晚望少室》云：“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重九后一日作》云：“重阳拟作登高赋，一片伤心画不成”，《题家山归梦图》云：“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伤心画不成”，《雪香亭杂咏》十五首内有云：“赋家正有芜城笔，一段伤心画不成”。《玄都观桃花》云：“人世难逢开口笑，老夫聊发少年狂”，《同严公子东园赏梅》云：“佳节屡从愁里过，老夫聊发少年狂”。《此日不足惜》篇：“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争似高吟大醉穷朝晡”，《送李参军北上》诗内又有“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争似彩衣起舞春襕班”。《桐川与仁卿饮》一律：“风流岂落正始后，诗卷长留天地间”，《题梁都运所得故家无尽藏诗卷》亦有此联。《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云：“两都秋色皆乔木，三月阿房已焦土。”《存没》一首又云：“两都秋色皆乔木，一代名家不数人”，《答乐舜之》云：“两都乔木皆秋色，耆旧风流有几人。”《东山四首》有“天公老笔无今古，枉着千金买范宽”，《胡寿之待月轩》诗又有“天公老笔无今古，枉却坡诗说右丞”。《钱过庭烟溪独钓图》：“绿蓑衣底元真子，不解吟诗亦可人”，《息轩秋江捕鱼图》又有“绿蓑衣底元真子，可是诗翁画不成”。《台山十咏》内有云：“恶恶不可恶恶可，未要云门望太平。”《赠刘君用可庵二首》内一首云：“恶恶不可恶恶可，笑杀田家老瓦盆”，次首云：“恶恶不可恶恶可，大步宽行老死休。”《寄希颜》末句“共举一杯

持两螯”，《送曹寿之平水》亦用此句作结。此复句之最多者也。

自后惟萨天锡《题扬州驿》三四一联云：“寒砧万户月如水，塞雁一声霜满天”，而《雁门集》中有《过广陵驿》一首，又将此二句作五六一联，但改“塞雁”作“老雁”耳。又成廷圭《次李希颜述怀韵》领联云：“诸公莫诮王夷甫，我辈终慚管幼安。”《寄江西宋子与令尹》诗又以此二句作结，但改“诮”为“责”“终”为“深”耳。至高季迪而复句又多，如《饮韵西园公咏梅》有云：“春后春前曾独采，江南江北每相思”，而《和衍师咏梅》第三首亦有此二句，但改“采”为“看”耳。《次韵陈留公见贻湖上之作》有云：“叶应随鸟散，山欲趁波流”，《月夜游太湖》排律内亦有此二句，则并一字不换。《晚寻吕山人》有云：“君家最可认，隔树有书声”，《题徐山人画赠内弟周思恭》亦云：“君家还可认，为有读书声”。《送思上人》有云：“野饭晨留钵，城钟夜到船”，《送衍师》亦云：“村中乞米晨留钵，城外闻钟夜泊船”，虽化五言为七言，亦未换意。《咏樵》有云：“伐木惊禽起，穿云畏虎过”，又一首《咏樵》云：“穿云冲过虎，伐树起栖禽”。查初白《敬业堂集》卷九《送陈仲夔句》有云：“殷勤百里犹相送，万叠西山一故人”。卷十一中《出都别亲友》诗云：“京华回首无多恋，万叠西山几故人”，又卷九《漷县晚泊》诗云：“春水如油滑上篙”，十二卷《渡太湖》诗又云：“秋水如膏滑上船”，此亦诗之重出者也。^①

赵翼以任昉、宋璟、苏东坡、赵秉文、元遗山、萨天锡、成廷圭、高季迪、查初白等人诗中的句重为例，提出了“复句”的概念，认为其实质“此亦诗之重出者也”。把理论和考证相结合，赋予重出双重的范畴意味，其文献学术语的特征，也在对诗歌的艺术批评中逐渐彰显。

2. 文献学专业术语——篇目重复

从本课题的研究实际出发，在特定文献中，在篇章重复出现这个意义层面上，定义重出的概念是符合传统文献学应用实践的。

“序曰：今大戴篇始三十九，终八十一，当为四十三篇，缺者四篇，

^① （清）赵翼撰：《陔余丛考》卷 24，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第 492 页。

重出一篇。”^① 此处《大戴礼记》序文明确指出，篇章内容一篇重复出现。

文献重出误收，在早期的文献整理中普遍存在，这和文献体例不完善、文献未定型有极大关系。最典型的莫过于刘向父子的文献整理工作。

《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以新出世的《古文尚书》校订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文字异者，七百有余”，其间自不乏疑误。刘向（约前77—前6），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人，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刘向整理古文献时广罗异本，仔细比勘，去除重复，校出脱讹，编订篇章目次，确定书名。他每校勘完一部书，就把有关作者生平、思想内容、学术源流等整理情况写出一篇叙录，这些叙录汇编成《别录》一书，它有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巨大作用，开创了中国解题目录的范式。《别录》一书早已散佚，其学术思想，第次《七略》，入《汉书·艺文志》，得以保存，残存八篇“叙录”，是研究刘向校勘思想和文献整理方法的重要材料，其中剔除重复篇目条块，审定著者作品，是其勘定文献的重要一环。

《列子叙录》记载“臣向书六篇校订为五篇”。《晏子叙录》记载“臣参书十三篇校订为十一篇”。其中定有重出篇目。

又《晏子叙录》载“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管子书录》载：“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战国策书录》载：“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馀卷，错乱相糅。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孙卿书录》：“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杀青，简书可缮写。”《列子书录》：“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邓析书录》：“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复重为一篇，皆定杀

^① （清）朱彝尊撰：《经义考》卷138，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影印摘藻堂荟要本。